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江沛
刘忠良
编

林雷
同海
济宗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中 国 近 代
思 想 家 文 库



江 沛
刘 忠 良
编

林 雷
同 海
济 宗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雷海宗 林同济卷/江沛, 刘忠良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7

ISBN 978-7-300-18841-6

I. ①中… II. ①江…②刘…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②雷海宗 (1902~1962)-思想评论③林同济 (1906~1980)-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3930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雷海宗 林同济卷

江 沛 刘忠良 编

Lei Haizong Lin Tongji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47.25 插页 2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757 000	定 价	10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 17 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 19 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 1840 年到 1949 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近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选编说明

一、由于雷海宗、林同济先生所发表的大量文章，正逢中国抗战之际，不少报刊印刷质量较差，加上年代久远、保管不善，导致一些文字难以辨识，个别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谅解。

二、此次选编前，雷海宗、林同济先生的论著已有一些选本问世，选本主要集中于两人有关战国策派思潮的论著上，且多用后出的文集，雷同较多，也有一些误植之处。因此，此次选编我们坚持忠实原文的原则，努力找到雷、林两位先生文章发表的最初版本，除对明显错字进行了处理外，未做任何修改。

三、对于文中可能引起歧义的别字、错字，我们在〔 〕内予以注明；增补脱字，置于〈 〉内；衍文加[]。民国时期使用中不算错字、别字，不影响今人理解者，原则上不做修改或标注，以保持史料原貌。原文的注释在（ ）内表示，以示区别。原文因模糊无法识别者，以□表示。文前或文后的编者注是原文发表时的编者所加，本次编者注，以脚注的形式出现，以与原文编者注相区别。

四、雷海宗先生在一些文章中引用的古籍版本，与今日重新整理的点校版本有所不同，因而在卷次和名称上存在不一致，除对明显引用错误之处加以改正外，均保持原貌。

五、由于当时标点符号的使用与今日不同，我们只对明显有违今日标点符号使用规则之处，重新进行了标点。

六、按出版社的相关要求，雷、林两位先生的文章基本上是按发表的时间顺序排列的，未能确定准确时间的文章，均排列在发表年度的最后。

七、由于收集到的雷海宗、林同济先生的文章较多，限于出版社对

本丛书各册字数的要求，我们只能突出两人在文化思想、历史认识及国际形势评判等问题上的论述，主要删节了有关人生、学术、青年的文论，殊为可惜。

导 言

战国策学派文化形态学理论述评

——以雷海宗、林同济思想为主的分析

江 沛

抗战时期名噪一时的战国策学派，无论对世界历史、中国文化还是现实世界的认识中，其理论构架的核心就是历史形态学理论。在这一学派中，雷海宗与林同济又是对此倡导最力、著述最多的两位学者。

受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文化形态学说的影响，以雷海宗、林同济为代表的战国策学派，把五千年来世界上曾经出现过的高等文化区域划分为7个，在此基础上，雷海宗认为各种文化形态均经历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5个阶段；林同济则将各种文化形态的发展过程分为封建、列国和大一统帝国3个阶段。两人同时都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清理，雷海宗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文化独具“两周”的理论。雷海宗、林同济认为，20世纪30—40年代的世界正处于“战国时代”，只有抱坚定的抗战信心，才能拯救中国文化于覆亡；雷海宗甚至预言：中国文化将进入第三个发展周期。这一理论，不仅具有学术创造的重要意义，而且在中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具有砥砺人心、振奋士气的现实功效。

一、文化形态学的要素

15世纪“地理大发现”后，欧洲人得知了世界上还有发展层次不一的文化存在，它们形态各异，文明悬殊，风俗迥异，由此博物志、风俗志、民族学、人类学等新的学说逐渐兴起。18世纪末，拿破仑远征埃及后，欧洲又产生了以发掘地下文明遗物作为研究古代文明手段的考古学。19世纪，在相关学术研究数百年发展的基础上，欧洲学人得以对全世界各种文化形态发展的全过程有所了解，于是文化形态比较学应

运而生。

文化形态比较学的开拓者，目前所知是俄国学者丹尼拉维斯基(N. Danilevsky)，他于1869年发表《俄罗斯与欧罗巴》一文，将俄罗斯与西欧的文化形态进行了比较分析，这是最早进行文明比较的论著。1918年，德国人斯宾格勒出版了后来影响深远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将文化形态的比较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阐述，使文化形态比较学体系初成端倪。随后，欧美各国相继出现了二三十部有关文化形态比较研究的论著，其中最有名气的著作，要数英国著名史学家汤因比(A. Toynbee)耗费三十年心血完成的巨著《历史研究》(12卷)。

斯宾格勒提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各个独立文化的历史，因此，研究世界历史实质上就是研究各个文化的发展史。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征与精神，彼此沟通非常困难。要研究这个由不同文化构成的世界历史，必须采用全新的研究方法，以共时态的文化横向排列否定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斯宾格勒称这种方法为文化形态学(cultural morphology)。照他的看法，文化形态学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察的一种学说，是一种崭新的视角，具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①他提出，“对于每一有机体说来，生、死、老、少、终生等概念是带有根本性的”^②，和自然界万事万物一样，“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③，也就是说，不论一种文化具有何种特质，它的发展规律都是由盛到衰，因此各个异质文化间是有可比性的，异质文化间没有优劣之分，他把这种文化形态学的研究方法也称作“比较形态学”。

斯宾格勒认为，所有的文化形态发展均要经历前文化、文化和文明三个阶段，然后周而复始地循环发展。以这种理论估算，世界上已有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指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墨西哥等七个文化都已死亡，仅余下一种历史的余迹。唯有西方文化尚处于文明的第一时期——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连绵不断的战争，在战争中几个国家最终合并成为一个大帝国。战国时期之后是帝国时期，统一的大帝国出现，这个时期要到2000—2200年间出现。因此，表面

① 参见〔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1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② 同上书，13页。

③ 同上书，39页。

上斯宾格勒谈的是西方文化的没落，实质上却是从西方文化中心论出发，试图为西方文化寻求出路，同时也表现出各种文化间的平等发展的基本概念。

文化形态史观具有文化相对主义倾向，它以共时态的各种文明横向排列否定了历时态的各种“社会发展阶段”的纵向演进，任何文明都具有相似的生命历程。与进化史观不同的是，这里的文化生命历程不具有“进步”意义，一种旧的文化衰亡与新的文化兴起，并不意味着是由落后向先进的演进，而只是生命周期的新一轮循环。尽管各个文化或“文明”在经验上存在着时序的先后，但“在哲学意义上”，仍可以把它们都看作是共时态的。它不强调文明间的所谓优劣差异，在某种程度上也表达出一种反种族主义、反特定文化本位主义的普世人文主义价值观。^①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第1卷出版时，正是“一战”德国战败之际。世界八大文化中只有西方文化还处于青年阶段，而西方文化又以德国文化最为优秀的论点，令灰心丧气的德国人获得了巨大的心理安慰，这部晦涩难懂的历史哲学著作，一时在德国畅销不衰，成为学术界争相议论的话题。

20世纪前20年，西学东渐的浪潮在古老的中国大地波涛汹涌，无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希冀从西方现代性中找到“强国”的法宝，文化激进主义也好，文化保守主义也罢，都不再死抱着坚拒西学于国门之外的观念。在对中国文化未来发展走向的思考上，“中学为体”抑或“西学为体”的定位不同，只是在吸收西方文化的程度及方法上认识不一。20世纪20年代初，在学人张荫麟、张君勱的大力介绍下，斯宾格勒走进了中国思想界，文化形态学由此进入中国。

战国策派学人中，多数具有留洋经历。雷海宗和林同济先后留美，贺麟与陈铨相继留德，雷、贺、林、陈于1927年至1934年间先后回国。四人中，雷、林是阐释、宣扬文化形态学并运用、发挥于中国文化分析的主要人物，陈铨与贺麟则是接受这一主张并在学术上加以运用的。至今尚无法确定雷、林二人是何时接受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说的，但雷海宗在1936年、林同济在1938年已有较为系统的文化形态史

^① 参见秦晖：《文明形态史观的兴衰——评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载《中华读书报》，2001-01-17。

观则是无疑的，雷海宗运用文化形态学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论著，主要是在 30 年代后期完成的。

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同时，知识界开始从学理上重新检讨中国文化，吸收精华、剔除糟粕的文化复兴运动，以近代以来不曾有过的、强烈的“中国化”面目跃然出现。战国策派的代表人物雷海宗、林同济，并不同意一味“中国化”、“民族化”的文化复兴，他们希求在东西文化的对比与融合中找到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路。林、雷两人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收录了他们在 40 年代初阐述文化形态史观的 6 篇代表性论文，集中表达了他们在这一理论指引下对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发展走向的思考。

二、雷、林的独特视角

战国策派学人对于文化发展的思考是立足于历史考察的，他们从“全体”的文化形态史观出发，提出了不同于进化史观的历史分期方法，进而创造出了“战国时代的重演”这一全新的时代命题。他们所有关于文化问题的论述，均由这一命题延伸而来。

雷、林在强调诸文化发展独立性与特异性的同时，同样注重研究各个文化间的共同点，这就是他们常常谈及的“历史形态”或“文化形态”。雷海宗指出：“历史进展大步骤的公同点，现在已逐渐成为学者所公认的现象。这种公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①，所以，文化形态学就是以文化为考察单位，以寻求它们之间共同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这种历史形态的具体表现，就是各个文化在不同的“空间范围”经历的几个大致相同的“时间范围”，即历史阶段。

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学理论，雷海宗认为每一种独立发展的文化，都有一个青春勃发—茁壮成长—繁荣昌盛—枯萎凋落的生命周期，都要经历封建、贵族国家、帝国主义、大一统、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等五个阶段（见表 1）。

第一阶段是封建时代，时间约为 600 年。这一时期各个文化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现象较为特殊。在政治上的主权是分化的。每个文化空

^① 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02-04。

间范围内都有一个最高的政治元首，但这个元首并不能统治土地与人民，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只是理想而已。元首直辖的土地只有王畿区域，在王畿内，也有许多卿大夫的采邑维持半独立状态，元首、诸侯、卿大夫、家臣等，对土地逐级分封。这一时期，社会上划分了明确的阶级，每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等级、义务、权利、责任以及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方式，都有公认的法规来认定，阶级是世袭的，其界限相当严格。在经济上，所有土地都是采地而非私产，极少可以自由买卖。在精神上是宗教的天下，宗教事务覆盖了人类所有的生活。^①

第二阶段是贵族国家时代，以贵族为中心形成列国并立是典型的时代特征，前后约 300 年。在政治上，封建时代的共主“渐渐全成傀儡，有时甚至整个消灭”，卿大夫及各级小贵族也日益没落。诸侯成为最有势力的阶级，他们控制各自的封疆，实行高度集权，主权分化现象不复存在。地方动乱大大减少，国际间战争的目的，“只求维持国际的均势，没有人想要并吞天下”。在社会上，士庶之分仍然维持，但平民可以升为贵族。在经济上，井田制一类的授田制依然存在，但自由买卖土地得到承认。在精神上，宗教仍占据主流地位，但理性思想开始传播，对于宇宙、人生的奇思异想及伟人、圣哲都产生于这一时期。^②

第三个阶段是帝国主义时代，前后约 250 年。这一时期发生了政治、社会与经济上的大革命。革命推翻了贵族阶级，平民阶级夺取政权，得到了一个形式上的全民平等社会。随后社会动荡与国际间战争重起，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对方的实力，最后占据对方的领土，灭掉对方的国家”。由于阶级的消灭，全民皆兵的征兵制出现。在连绵的战争中，集权干预文化与思想的自由，思想趋于派别化，创造性思想极为缺乏；只有毫无中心见解的杂家贩卖辞章，杂家的出现，意味着哲学的终结。^③

第四个阶段是大一统时代，前后约 350 年。经过帝国主义时代的大战，一个强国吞并天下，出现了“整个文化区的大一统局面”。在政治上，为强化控制实行专制独裁，在社会上，物质较前有大的改善，但

① 参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见林同济、雷海宗：《文化形态史观》，20～21 页，上海，大东书局，1946。

② 参见上书，22～24 页。

③ 参见上书，24～25 页。

“颓风日愈明显”，尚武的精神衰退，文弱习气风靡，征兵制无法维持而改为募兵制。帝国疆域空前扩大，但帝国实力并不强大。在文化上，思想学术与文艺急剧退步，政治与文化冲突激烈，“思想学术定于一尊，真正的哲学消灭，文人全失创造的能力，只能对过去的思想与学术作一番解释、研究与探讨的工夫，并且其中时常夹杂许多附会、误会与望文生义的现象。一言以蔽之，文化至此已经僵化，前途若非很快的死亡，就是长期的凝结”^①。

第五个阶段是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时间不定，“这是三百年大一统时代后无从幸免的一个结局”。政治腐败，体制衰退，个人主义严重，内乱外患不断，古老的文化从此一蹶不振，在与外族的争端中走向彻底毁灭。

表 1 世界四大文化周期比较表

文化 阶段	埃及	希腊—罗马	西欧	中 国	
				古典中国	综合中国
封建时代 (600 年)	前 2800—前 2150 年旧国王时代	前 1200—前 650 年王制时代	911—1517 年中古时代	前 1300—前 771 年封建时代	383—960 年南北朝、隋、唐、五代时代
贵族国家时代 (300 年)	前 2150—前 1850 年中期国王时代	前 650—前 323 年贵族国家时代	1517—1815 年旧制度时代	前 770—前 473 年春秋时代	960—1279 年宋代
帝国主义时代 (250 年)	前 1850—前 1600 年希克索斯时代 (Hyksos)	前 323—前 82 年后期希腊罗马时代	1815 年以后帝国主义时代	前 473—前 221 年战国时代	1279—1528 年元、明时代
大一统时代 (350 年)	前 1600—前 1250 年新王国时代	前 82—180 年罗马帝国的盛期		前 221—88 年秦、东汉中兴时代	1528—1839 年晚明盛清时代
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	前 1250 年以后波斯、罗马帝国统治	180—476 年		89—383 年东汉末年、三国、魏晋时代	1839 年以后晚清民国时代

注：雷海宗认为，印度、巴比伦及伊斯兰文明的资料因不可靠或匮乏的缘故，无法进行较为系统的比较。

资料来源：此表据雷海宗所著《三个文化体系的形态——埃及·希腊罗马·欧西》（《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13 期，1942 年 2 月 25 日）和《独具二周的中国文化——形态史学的看法》（《大公报》“战国副刊”第 14 期，1942 年 3 月 4 日）编制而成。

^① 雷海宗：《历史的形态——文化历程的讨论》，载《大公报》“战国副刊”，1942-02-04。